

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促进农民生育行为的转变

彭希哲

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控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便是较低的人口增长率也将给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负担,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在经历了70年代令世人瞩目的迅速下降以后,中国妇女生育水平的进一步降低正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目标、方法和工作体系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并不断趋于完善。人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在保持卓有成效的行政干预的同时,人口控制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改变育龄夫妇传统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实践。为此研究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促成这些因素向有利于低生育率的转化,是确保中国人口控制目标实现的一项重要而又亟需进行的工作。

中国妇女的生育行为基本上都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夫妇双方生理的和行为的特征,对其生育子女数以及生育的时间分布有着直接的影响。研究表明,婚姻状况、生殖能力、文化教育水平、职业分类、经济收入等个体水平上的各种背景因素,对形成个体生育观念乃至生育行为的影响力是勿容置疑的。但不能由此而把生育推断成一种个人的行为。

从理论上讲,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是必然的,个体行为的变异也是无限的。但个体行为并不呈现完全的独立性,它总是被控制在社会所能允许的限度以内。由于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共同享有相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准则,并受制于一定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形式,人们对周围事物的反应及其行为有着严密的一致性。生育行为作为人们诸多行为组合中的一种,当然也不例外地表现出在同一社会环境中的趋同现象。

辩证唯物论的社会历史观告诉我们,社会意

识反映社会存在并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宏观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环境对个体层次上的过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我们在进行地区间或跨文化比较研究时,这种区域内部由于育龄夫妇个体差异而导致的生育行为的差异性就常常被宏观层次上的或区域之间的差异所涵盖,而显得几乎是微不足道的^①。生育行为是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和社会生产方式之中的,中国妇女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主要是由她们生活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生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人类自身再生产规律的认识。但离开了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孤立地在微观层次上进行研究,就无法告诉我们人口变化的根本原因,并可能导致错误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农村目前的发展水平下,社区(乡村)是农村夫妇作出生育决策的最直接的社会环境。社区作为一个结构功能相对完整的微观社会,早在本世纪30年代就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对象。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就是个范例。在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社区研究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②。但是人口学界尚未对社区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人们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全国或家庭的层次上。在分析国家宏观人口政策和农民群众对计划生育的理解与接受程度以及落实情况时,社区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在分析地区间生育转变的差别时更是如此。

经济发展水平是构成社区特征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并被普遍认为与生育率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

①彭希哲《广义线性模型在差别生育率分析中的应用》,《人口研究》1990年第2期。

②方明《社区研究述评》,《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系。形成于本世纪40年代的人口转变理论的核心,即是以经济发展作为解释人口转变的动因。但是,这种理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世界生育率调查和对欧洲生育率变动的研究都表明,生育率的下降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相关性^①。在一个国家内部,区域文化诸如语言、宗教和礼仪习惯等,在许多情况下是比经济发展水平更为重要和直接影响生育率地区差别的原因。中国计划生育的实践更证明,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里促成生育率的降低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发地导致生育行为的转变。中国东南沿海个别省份和地区,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条件下,其总和生育率却高于国内许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省区。一些微观研究也发现,农民在致富以后并没有相应降低对生育子女数的要求。这里有一个如何衡量和测定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生育行为的不同作用的问题。人口学家一直在试图找到一个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并试图证明只有当经济发展达到或超过这一水平时,才会诱发生育率的下降。但是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上有很大的差别。在不同的地区、社会 and 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是同一地区不同的社会阶层,引发生育行为转变所需的经济水平可以是大不相同的。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要否定经济发展对生育行为的决定作用。中国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别和人口控制的不平衡性,与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密切的关系^②。我们想要指出的是,不能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忽视了其它非经济社会因素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作用。就经济因素而言,重要的恐怕不在于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或绝对的富裕程度,而是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以及各种经济成份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而忽视各地区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社区组织制度的多样性,过于追求寻找一些普遍适用的模式和理论框架,也会影响我们对生育行为的决定因素的正确而全面的理解。

三

在一定的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的约束下,利益的选择和目标的实现是人们各种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中,人们的基本目标可能是多种多样而难以穷尽的,但最基本的也许可以归纳为确保个人或家庭社会地位的稳定和上升,以及人生安全保障的获得^③。具体到生育决策上,

则表现为对生育和抚育子女所能带来的利益,即子女的价值特别是子女经济价值的权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经济功能,以及其它必须由家庭来完成的社会功能,同时还取决于子女开始为家庭经济作出贡献和经济上开始独立于父母家庭的年龄、子女经济活动的的能力、经济效益和保持经济活动的时限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常常是独立于家庭自身的控制之外,仅取决于该家庭所处的那个特定的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文化环境。在稳定而落后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形式、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对强壮劳力的需求条件下,子女的短期经济价值几乎完全由家庭内部的就业机会所决定。随着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家庭以外获得就业机会。其经济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在一定市场范围内参与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和取得的经济收入的客观条件。普及教育就是对儿童参与经济活动机会的一个重要干预因素。它推迟了儿童开始为家庭经济作出贡献的年龄并提高了生育、抚育子女的成本,也为旧的传统观念包括生育观培养着叛逆者。而某一地区儿童获得经济收入机会的存在又可能成为该地区教育普及难以全面贯彻的重大障碍。我国农村部分地区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的流失辍学现象与此是不无关系的。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作物的种类、社区经济纳入市场经济的程度、就业模式、经济活动所采用的技术、以及组织结构和形式等社区环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一地区子女潜在的经济价值,并为实现这些价值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可能性,从而也决定着对生育子女数的选择。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无疑对中国人口控制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民家庭功能的强化,可能导致生育意愿的上移。为增加劳动力并由此而实现家庭富裕是在生产责任制条件下农民希望多生育的原因之一。但我们的研究发现这样的生育动机所

① A. Coale and S. Watkins (eds)《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顾宝昌:《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中国人口科学》1987年第2期

③ S. Greenhalgh, "Fertility as mobility: Sinitic trans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éminar on Societal Influences on Family Planning Programme Performance, Jamaica April, 1985

占的比重并不如人们所预想的那么大。生产责任制提供了家庭经济多样化的可能性,也为农村妇女创造了更多的为家庭增加收入的客观条件。换句话说,农村妇女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较改革以前大为提高了。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出于对子女能在现时或不远的将来为家庭创造经济收益的短期考虑,而主要在于子女能在保障方面所提供的长期经济效益。

代际之间的抚育和赡养,是人类种族绵延的基本形式。为了老年的生活保障而生育子女的观念将始终存在。即使在经济生活和护理服务高度社会化的地方,子女在养老方面的作用也是无法被完全替代的。中国农村改革在强化了家庭功能的同时,也提高了对子女作为老年保障来源的期望。在我们进行的调查中,几乎有一半农民认为子女多少与老年生活的美满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下,生育子女以期得到老年生活的保障仍然是风险最小而收益可能性最大的选择。在中国农村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下,单个农业劳动力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在很多地区都难以满足农民家庭对养老的需求。而儿子与女儿在养老方面的客观差异以及由风俗惯例等文化传统而形成的世俗偏见,则是形成“重男轻女”生育观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农村,养老责任的分担和赡养形式受到区域文化的极大影响。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日常生活社会化的程度也对此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自然经济和大家庭存在的条件下,养老的职能几乎完全是由家庭、子女来完成的。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养老形式也日益多样化、社会化。非家庭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老年保障的看法,促成生育率的降低。

四

人们从计划生育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人口问题需要综合治理。在扶贫与人口控制相结合,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相结合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农村社区建设也正是综合治理的措施之一。区域文化、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社区环境的千差万别。与此相适应,社区建设也将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依,它对改变农民生育行为的作用也会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值得讨论。

(一) 促进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为行政干预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后盾。70年代中国农村生育率的

迅速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引导而由行政干预保证的。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改变了以往计划生育能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条件,首先是削弱了乡村政权对农民婚姻和生育的行政约束力量。由于我国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村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或刚处于萌芽状态时开始生育率转变的。农民生育意愿和国家人口控制目标之间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由行政干预来解决的。农民为了国家的总体利益在生育子女问题上作出了牺牲。当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处于涣散半涣散状态时,政府对农民施加影响的渠道出现阻塞,这使得因行政干预而受到压抑的生育意愿有可能得到实现,从而出现生育水平的反弹。

对计划生育的行政干预应当强化。而这种强化应当以集体经济的壮大为后盾,是与集体对个人和家庭经济生活的影响和控制能力紧密相关的。计划生育的许多措施都依赖于集体经济提供的经济上的保证,老年保障的逐步社会化也必须以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家庭的经济功能,但集体在社区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未消失。基层政权对农民个人直接的行政干预减少了,间接的经济干预却可能增加。农机服务、水利灌溉、乡村企业、卫生医疗保健等,仍主要为集体所掌握。当农民日益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走向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他们对乡村政权和集体经济实体的依赖更加强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得农民更多地依靠集体来提供生产服务和技术指导。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中国农业生产正经历着从家庭生产方式向非家庭生产方式的又一次转移。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一步加强农村社区在组织农村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将对农民家庭生育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就计划生育而言,行政干预只有以经济影响为后盾才能真正有效。

(二) 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建立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农村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人口控制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构成了双向循环圈。寻求这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的途径,是综合治理农村人口问题的核心。西方国家在经过上百年实践以后形成的保障体系和保障理论,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以适应人口控制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保障体系的社会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由国家或

由全社会来组织农村保障体系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内部差别,单项保障措施和整体化的保障系统的运作机制,必须适应各地的社会经济和传统文化背景。而且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能用于社会保障的经济资源相对于实际需求来说是不够的,因此,充分利用社区资源,以社区为单位建立国家、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综合保障体系,将可能是现实可行而成本效益又较高的一种选择。这里不仅仅是经济投资问题,而在于充分发掘社区内各种可以动用的力量,尽可能发挥好社区总体资源的效用。老年保障体系的建立,首先是对农民防老心理的一种解放。因此,应当使现有老人尽快享受这种哪怕是初级的保障,而不是等目前的育龄夫妇进入老年后才发挥作用。计划生育部门和各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在建立和管理老年保障体系问题上需要协调,而这种协调在社区却是自然存在的。社区保障系统将对计划生育工作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三) 淡化亲属体系在社区中的作用,消除宗族势力对计划生育的不良影响。家庭结构和亲属体系是社区组织结构的重要部分,它们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但又常常独立于经济因素之外。人们依此而给予这种体系某种稳定性。亲属体系受到区域文化的很大影响,并成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特征。家族力量的存在使得人们的生育决策超越了单个家庭的视野,而服从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集体利益。由于封建宗法势力的存在,人多势大常常成为一些农民多生育的动机之一。很显然,计划生育工作者在一个其工作对象和他有一定的血缘亲属关系的环境中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在中国农村部分地区,由于基层行政力量的削弱而形成的权力真空被宗族势力所填补。解放以后,我们曾成功地把农民凝聚的中心从家庭和家族转移到国家和集体。在农村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结合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采取必要措

施,以促使农民主要的社会联系从血缘姻缘向地域和职业转化,这将有利于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四) 提高基层干部的管理水平和宣传教育的效果。农村基层干部的领导管理水平对农民生育行为的转变有重要的意义。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使农民的生育意愿也随之发生了一些不利于人口控制的变化。而计生队伍人员素质的提高并没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计划生育的宣传也远远跟不上需要。我们的宣传在对象、内容和方法上都需要重新框定和更新。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作为实行计划生育的主要理论依据,显然是难以说服农民并使之自觉接受计划生育的。

一个稳固的社区能对其成员产生足够的社会压力,以促使其按社区成员公认的行为准则办事。当社区本身利益受到威胁时,社区会不断提高控制人口增长的意识,并以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来规范社区成员的生育行为。计划生育的宣传也应当以此为出发点。当然,人们并不总是盲目地追随某种限制或完全服从于社区的行为规范。文化的传播和辐射,是我们这个时代每天都经历着的事情。随着现代信息交流的扩散和商品经济的渗透,社区已不是封闭的基层单位,社区的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生育行为的转变将首先在传统的价值体系所能认可的范围内以一种新的行为来替代老的,然后才是对传统习惯的真正突破和对旧价值体系的否定。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的变革所引发的人们生育行为的变化,要比由长期经济发展而形成的行为规范的变化快得多。在这方面,宣传教育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没有生育决策环境的根本变化,思想工作和行政措施的效果将是有限的,特别是当生育率已降低到补偿水平左右时更是如此。

(本文责任编辑:汪正鸣)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上接第33页)

Russel, W.T. (1936): “出生时性比例的统计研究” 卫生学杂志 36(3)。

段纪宪(1984): “中国的性别危机与出生时的人口性比例”(未发表的论文,已由北京大学生物系翻译)。

Visaria, P.W.: “有完整人口登记的地区的出生时性比例” 优生学季刊 14(第二期)

Williarnson, N.E. (1978): “男孩还是女孩? 父母的偏好与性别控制” 人口公报 33(NO.1)。

Williamson, N.E. (1976): “儿子还是女儿? 父母偏好的一项交互文化调查”(美) Sage 出版社出版。

(本文责任编辑:洪映)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